

壹、研究背景與動機

教育乃是關係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核心，而學生身為教育的主體，學生學習更是橫跨任何教育議題所強調的關鍵，任何教育舉措的目的，就是在於提升學生學習的成效。換言之，就少子女化、高齡化、全球化等時代潮流，關注學生學習仍為未來教育發展的主軸（吳清山，2017）。傳統而言，無論就學校效能、教師社群或教育領導，均重視學生學習，並以學生學習效能作為判斷學生表現的依據（丁一顧，2017；DuFour, 2005; Green, 2017），對照現今國內教師專業發展倡導的公開備課、觀課與議課，也應從教師教學導向轉化為以學生學習為焦點（劉世雄，2017）。同時，誠如美國教育研究協會（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, 2018）所提倡公共教育的反省，在新時代應思考如何促進領域的方法，創造新的工具和證據，以形成新知識。因而，在持續關心學生學習的脈絡背景，探究位於新時代相關學生學習成效的重要變項，可幫助國內教育領域，明確開創有關於學生學習成效的新視野。

近年來，國外學者Hoy綜合國際間研究認為，統整正向心理學、自我效能論、社會認知論等觀點，可形成一種「學業樂觀」（academic optimism）的新變項，且藉由國際研究發現，均指出可跨越家庭背景影響，顯著影響學生學業成績（Gürol & Kerimgil, 2010; Hoy, Smith, & Sweetland, 2002; Wu, Hoy, & Tarter, 2013），亦可言之，學生成就與學生的自我效能信念、教師教學信念、教師合作效能信念等學業樂觀變項有關（Hoy, Tarter, & Hoy, 2006）。此種結合樂觀、正向與互動的概念，並與學生成就相關的新變項，自然獲得學術研究領域的關注，原因在於樂觀係指對於正向事件結果所做的內在、特質、普遍性歸因，可以培養和學習（Luthans & Youssef, 2007），且對於意義性生活是無



價的 (Seligman, 2006)。對應國內長期探析如何疏緩學生壓力的議題，不僅升學制度、社會文化與評量方法等制度革新外，加強生涯輔導、生理與心理關懷、瞭解壓力向度均屬於因應策略 (許嘉容、吳裕益, 2007)。承上，學業樂觀從正向心理觀點出發，著重人際互動信任，以及學校環境對學生學習的協助，不只是已得到國際間矚目，也適合從學生學習成效角度，探究學生學業樂觀之概念結構於臺灣國情的適切性，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一。

另一方面，社會易存有強勢與弱勢者的現象，故需透過弱勢者教育等理念，強調促進社會公義的重要性 (陳炫任、曾大千, 2011)，因而就分析學生學業樂觀的同時，國內偏鄉弱勢學生的學習也是值得探討的環節。如同張良丞、許添明與吳新傑 (2016) 的研究指出，雖然近年來促進偏鄉弱勢學生已做了努力，但學習成就依然呈現嚴重的城鄉差距；Renth、Buckley與Puchner (2015) 針對學生在校表現與家長期望等角度進行分析發現，偏遠學校依舊存在差異性。現今關注社會正義與弱勢教育的公平，已成為教育領域所倡導的前瞻研究議題 (王麗雲、楊志堅、相子元、柯皓仁, 2017)，如何提升偏鄉地區學生的學習成效，是一個迫切的需求，以身為學校教育靈魂人物的教師而言，則應增加對弱勢學生的信任與尊重，相信其具備成功學習的能力 (許添明、葉珍玲, 2015)，弱勢學校應該要設計課程，來形塑高期待和成功連結的學習文化 (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-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, 2012)，但顯然造成偏鄉學生學習成就低落的問題，其來源複雜，許多偏鄉教師對這些問題的認識是相當缺乏的 (楊智穎, 2011)。依據上述，偏鄉地區學生的學習議題值得高度探析，其差異性顯著存在於教育現場，而理解其信任、尊重、高期待與學習文化等面向，對於弱勢學生學習更顯重要性，但教師對於弱勢學生的問題意識仍顯不足，事實上，在教育場域，學術樂觀概念除了屬於熱門